

元代畏兀儿 宗教文化研究

王红梅 杨富学 黎春林/著



 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9BZS011) 成果
西华师范大学学术出版资助

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

王红梅 杨富学 黎春林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畏兀儿(回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善于接受、融摄外来文化的民族,尤其在宗教信仰方面更是如此,它在西域、河西一带遗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本书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石窟壁画与题记为主,结合汉文传世文献及域外文献,对元代畏兀儿人的宗教信仰、宗教嬗变及其宗教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书中从回鹘文文献入手,论述了回鹘文献的数量类型、研究现状及其断代方法,着重阐述了佛教护国思想的形成、内涵及其对回鹘的影响,并通过对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和榆林窟的研究,追踪了河西回鹘的活动及其最后的去向。

本书可供对敦煌吐鲁番学、新疆地方史、西北民族史感兴趣者参阅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 / 王红梅, 杨富学, 黎春林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03-050696-2

I. ①元… II. ①王… ②杨… ③黎… III. ①维吾尔族—宗教文化—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B928.2 ②K2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2787 号

责任编辑: 任晓刚 / 责任校对: 何艳萍
责任印制: 张克忠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联系电话: 010-64026975
电子邮箱: chenlia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科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1/4 插页: 4

字数: 230 000

定价: 8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在我国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献中，回鹘文文献是其中最多的一种，随着回鹘人的南迁，回鹘文文献流行于 9—14 世纪的新疆地区，河西走廊则延续至 18 世纪初，既有宗教经典的书写，也有社会世俗文书，还有碑铭石刻，赖吐鲁番、敦煌等地下文化宝库得以保存至今，成为我国多民族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很值得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回鹘文文献中较多的是对各种宗教经典的书写及各种宗教活动的记录，有摩尼教、景教、道教的，而更多的是佛教，显现出了各种宗教文化的特色，而将这些特色呈现得最充分的是元代。

作者杨富学、王红梅等长时期以来从事对回鹘文宗教文献的研究，成果累累。现在，他们抓住了元朝前后这一历史时代的特色，以“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为题作出全面具体的深入研究，既是对元代畏兀儿宗教文献作出全面系统性的整理和研究；也是对此前国内外研究元代畏兀儿宗教文献成果的归纳和总结。其重大意义在于，通过回鹘宗教文化对新走上政治舞台的蒙古贵族的重大影响，在回鹘人与蒙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语言文字相近相通、宗教信仰及政策相同，政治理念一致的特殊关系，而这种关系，既带来了蒙元帝国宗教文化上的繁荣，也促进了蒙元帝国政治及其制度上的建设，从根源上回答了畏兀儿人何以在元朝享有特殊的优宠地位。

本著作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对元代回鹘文宗教文献的归纳及其断代多有贡献，如对回鹘文本《观世音本尊修法》这部藏经经典的作者及刻印年代，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对回鹘文《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题记断为 1313 年的分析中阐释出元代畏兀儿人对北斗七星的信仰；对回鹘佛教中的护国思想源流演变及其与护法思想融为一体性的分析；对敦煌莫高窟第 464 窟早期为北凉禅窟的论证、依据壁画、题记及所存写经确定为现存壁画为元代之物而非西夏窟的判断和论证等，这些都是依据大量文献和文物结合历史典籍，在学术上作出的超越于前人的新推进、新研究。

将这么多可喜新成果汇为一体，即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贡献于海内外学术界之际，我作为一名优先的读者，乐于为之一序。

陈国灿于珞珈山

2017 年 7 月 7 日

目 录

绪论 / 1

第一章 元代回鹘文的使用概况

第一节 回鹘文的来源与兴衰 / 15

第二节 回鹘文文献的类型 / 16

第三节 回鹘文与蒙古文字 / 18

第四节 回鹘文印刷术 / 20

第二章 元代回鹘文佛教文献

第一节 回鹘文佛教文献史学断代 / 24

第二节 元代佛教文献述略 / 33

第三章 回鹘文藏密经典《观世音本尊修法》研究

第一节 刻本文献断代探析 / 49

第二节 回鹘文原文转写 / 57

第三节 汉译文 / 62

第四节 注疏 / 63

第四章 交流与融汇：元代藏传佛教对畏兀儿的影响

第一节 回鹘文文献中的藏密经典 / 65

第二节 畏兀儿人使用八思巴文 / 68

第三节 六字真言在畏兀儿中的流行 / 70

第四节 小结 / 73



第五章 元代畏兀儿北斗信仰探析

——以回鹘文《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为中心

第一节 《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的来源 / 75

第二节 回鹘文写本的现状 / 77

第三节 小结 / 82

第六章 护法与护国：回鹘王室与佛教之关系

第一节 护国思想内涵探微 / 85

第二节 佛教在回鹘中的弘传 / 87

第三节 护国佛典译入回鹘文 / 91

第四节 营造石窟礼佛供养 / 93

第五节 王室出资刊印佛典 / 97

第六节 小结 / 101

第七章 元明之际畏兀儿宗教嬗变

第一节 蒙古统治者的宗教政策 / 104

第二节 伊斯兰教的扩张与畏兀儿佛教的衰败 / 107

第三节 畏兀儿人伊斯兰化的影响 / 113

第八章 敦煌莫高窟第 464 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

第一节 张大千的记述及存在的问题 / 116

第二节 西夏石窟说驳议 / 118

第三节 原窟为北凉禅窟 / 124

第四节 出土文献及相关问题 / 128

第五节 甬道二壁回鹘文榜题译释 / 130

第六节 现存洞窟与壁画之断代 / 136

第七节 小结 / 144



第九章 河西地区回鹘石窟研究

第一节 榆林窟回鹘文威武西宁王题记研究 / 145

第二节 酒泉文殊山：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 / 150

参考文献 / 157

附录 元代蒙古王室与畏兀儿亦都护家族联姻 / 171

索引 / 182

缩略语表 / 186

图版

绪 论

元代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也是我国历史上多元民族文化、多种宗教信仰盛行的重要时期。伴随着蒙古族入主中原，西域、中亚诸民族纷至沓来，陆续迁居中原地区，带来了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同的宗教信仰。为了维持庞大的帝国，蒙古统治者推行各教并举、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对不同的宗教文化皆能兼容接纳。这种宽容的宗教政策一直延续到蒙哥汗时期。至忽必烈，蒙古统治者开始热衷于藏传佛教，在全国范围内极力推崇藏传佛教，但对其他宗教实行兼容并蓄的政策。

蒙元时期是畏兀儿宗教信仰嬗变的重要阶段。畏兀儿人逐渐舍弃了原来信奉的佛教、景教、道教、儒教等，接受了伊斯兰教，逐步过渡到宗教信仰的一元化。迁居内地的畏兀儿人仍保持传统的佛教信仰，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佛教徒。然而，西域的畏兀儿人信仰出现了严重分歧，居住于“五城”一带的畏兀儿人仍信仰佛教，由大乘佛教为主转向以藏传佛教为主；而居住于天山以南地区的畏兀儿人已接受了伊斯兰教。至察合台汗国时期，畏兀儿人伊斯兰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这一过程中，察合台诸汗的宗教政策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伊斯兰教势力凭借着政治权势与军事实力，陆续征服了库车、吐鲁番、哈密等地的佛教势力，最终实现了西域地区的伊斯兰化与突厥化。伊斯兰教逐渐成为西域地区各民族的共同信仰，对当地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社会经济以及民族融合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学术史回顾

（一）回鹘文及其文献研究概况

回鹘文是畏兀儿人使用长久、存世文献最为丰富的古文字之一。回鹘文字是在中亚粟特文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约在 8 世纪回鹘人对粟特文进行改进，使之适应于回鹘语，并在北方突厥语诸民族中得到广泛使用，故而历史上称之为回鹘文。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字母的数量有所变化，但一般有 18—23 个字母，其字母在词首、词中及词末有不同的词形变化。9—15 世纪，回鹘文广泛流行于今中国新疆、甘肃、中原及中亚地区，为以回鹘为代表的北方突厥语诸民族所使用，用于记录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契约文书等，并遗留下了大量的文献。

自 20 世纪初，新疆吐鲁番、哈密，甘肃敦煌、酒泉等地相继出土了数以千计的回鹘文文



献, 让人们对畏兀儿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经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回鹘文文献内容庞杂, 数量甚为丰富, 囊括了社会经济、宗教典籍、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 但是数量最多者则为佛教文献。仅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就有约 8000 余件, 绝大多数属于佛教文献。从现已刊布的文献来看, 回鹘文宗教典籍以佛教文献为主, 回鹘人纵然不是将《大藏经》的全部经典, 至少也是将《大藏经》中经藏、论藏类的主要典籍, 都译成了回鹘文。

自 20 世纪初, 随着大量吐鲁番、敦煌文献流失海外, 德国、俄罗斯、日本、法国等国均收藏了数量可观的回鹘文文献。因此, 国外学者最先投身于回鹘文文献的解读、研究之中, 先后涌现出一大批国际知名专家, 如德国学者邦格 (W. Bang)、葛玛丽 (A. von Gabain)、彼得·茨默 (Peter Zieme), 俄罗斯学者拉德洛夫、马洛夫 (S. E. Malov), 日本学者庄垣内正弘、森安孝夫、百济康义等。他们毕生致力于突厥文、回鹘文文献的解读与刊布, 为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最早从事突厥碑铭的研究者首推韩儒林先生。他早年留学法国, 师从极负盛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攻读蒙古史、中亚史及其古文字, 后转至德国柏林大学深造, 1936 年完成了《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此后, 他参考国外的研究, 将《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噶欲谷碑》翻译成汉文^①, 虽然其汉语译文未能摆脱外文的窠臼, 但是, 他利用突厥碑文研究突厥官号^②, 开辟了新的研究方法。此后, 王静如对突厥碑铭进一步补充, 发表了《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③

冯家昇先生是我国最早关注回鹘文文献的学者。他将北京图书馆馆藏的回鹘文《玄奘传》影印出版, 陆续发表了《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④、《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⑤、《1959 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⑥, 获得了国内外回鹘学界的认可和重视。

耿世民是我国古代突厥语、回鹘语文献研究领域的翘楚, 为回鹘学的发展付出了毕生心血, 他在这一领域的卓越贡献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自 1958 年起, 他开始致力于钻研古代突厥文、回鹘文文献, 发表了《古代维吾尔人的语言与文字》。^⑦1976—1980 年, 中央民族学院开办了我国第一个古代突厥—回鹘语学习班, 耿世民负责编撰了《古代突厥文献选读》《古代突厥语文献语法》等 8 册教材, 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突厥语研究人才。1978 年, 耿世民论述了

① 韩儒林:《读阙特勤碑札记》,《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5 年第 6 期;韩儒林:《读苾伽可汗碑札记》,《禹贡》1937 年第 4 期。

② 韩儒林:《突厥官号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 年第 1 号。

③ 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辅仁学志》1936 年第 1、2 合期。

④ 冯家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刊》丙种第 1 号,北京:中国科学院,1953 年;冯家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见《冯家昇论著集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373—375 页。

⑤ 冯家昇:《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考古学报》1955 年第 1 期,第 183—192 页。

⑥ 冯家昇:《1959 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文物》1962 年第 8 期,第 90—97 页。

⑦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人的语言与文字》,见袁家骅等:《少数民族语文论集》第 1 集,上海:中华书局,1958 年。



维吾尔族历史上使用过的文字及其佛教信仰，发表了《谈谈维吾尔族的古代文字》（《图书评介》1978年第4期）和《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新疆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程溯洛先生利用突厥碑铭，考证唐朝与回鹘的民族关系，发表了《释汉文〈九姓回鹘毗伽可汗〉中有关回鹘和唐朝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开始重视对民族古文字文献的保护与整理，耿世民先生在回鹘文文献的整理与刊布方面贡献突出。1980年，耿世民发表了《古代维吾尔族文字和文献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3期），叙述了维吾尔族历史上所使用过的几种古文字及其文献研究现状。1983年，耿世民出版了《维吾尔族古代文化与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探究了突厥文、回鹘文及阿拉伯文字的来源、使用及其文献概况。1989年，耿世民先后在《语言与翻译》第2、3、4期发表了《敦煌出土回鹘文献介绍》（一、二、三），1990年又连续在《语言与翻译》第1、2、3期发表该文章的后续内容（四、五、六），全面而详细地介绍了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的编号、收藏地、整理者及其研究成果。此后，耿世民介绍了柏林吐鲁番研究中心，论述了吐鲁番地区各种古文字文献的出土、收藏、研究、编目及数字化等问题。^①

1994年，耿世民出版了《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详细介绍了新疆、敦煌出土的古代突厥文、回鹘文文献。^②2001年，耿世民推出了《新疆文史论集》，系统地阐述了古代新疆的历史文化、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③2008年，耿世民先生出版了《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对这部著名的回鹘文佛教剧本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④

近年来，回鹘文文献在吐鲁番、敦煌等地不断出土问世。1980—1981年，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柏孜克里克石窟底层进行清理，收集了一批汉文及回鹘文文书，其中回鹘文文书残片有100多件。^⑤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挖掘，发掘出了大量的汉文及各种民族古文字文献，而回鹘文文献数量可观，达128件之多。^⑥雅森·吾守尔、张铁山对这些回鹘文文献进行了解读和刊布。^⑦此后，

① 耿世民：《德国柏林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介绍》，《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③ 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 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⑤ 多鲁坤·阙白尔：《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新出回鹘文书初探》，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⑥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出回鹘文文献综述》，《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第81页。

⑦ 雅森·吾守尔：《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部分回鹘文文献概述（一）》，见彭金章，王建军等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52—357页；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译释研究（一）》，见彭金章，王建军等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61—368页；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译释研究（二）》，见彭金章，王建军等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83—396页。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也对部分回鹘文献进行了研究。^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回鹘学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涌现出一批年富力强的学者。李经纬先生对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契约文书的解读和刊布用功甚多，先后出版了《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和《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这两本著作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丰富、最权威的回鹘文契约文书的汉译本。^②2012 年，兰州大学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出版了《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③李经纬也关注回鹘文佛教文献，对回鹘文《金光明经》和《弥勒会见记》进行了译释。^④

杨富学是我国回鹘学界崭露头角的新秀，在我国回鹘学研究领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研究范围广泛，涉及语言、历史、文化、宗教、经济等诸多方面，成果丰硕，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⑤迄今为止，杨富学教授先后出版了《沙州回鹘及其文献》《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佛教与回鹘社会》等 10 余部专著及译著^⑥，并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其中《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从佛典文献、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方面，探讨了回鹘文化的发展及其对周边民族的影响。

张铁山先生继承了回鹘学家耿世民先生的衣钵，回鹘文造诣深厚，熟悉佛典，其研究成果赢得了国际回鹘学专家的赞誉。莫高窟北区新出土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所藏回鹘文文献大多交付张铁山进行整理和解读。其研究成果丰硕，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枚举。牛汝极教授侧重于回鹘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分类研究，探究维吾尔族古文字的历史演变。他发表了《回鹘藏传佛教文献》（《中国藏学》2002 年第 2 期），甄别出 16 种译自藏传佛教的佛典，并先后出版了《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等专著。^⑦

①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佛祖历代通载〉残叶再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第 145—148 页；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叶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第 55—58 页。

②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年；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 年。

③ 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 年。

④ 李经纬：《回鹘文〈金光明经〉序品（片断）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 年第 4 期；李经纬：《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初探》，《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 1 期。

⑤ 乌迈尔江·努日：《维吾尔学家杨富学及其著作》，《新疆地方志》（维吾尔文版）2004 年第 1 期，第 41—46 页。

⑥ 杨富学：《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年；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

⑦ 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近些年来,新疆本土学者亦日益重视对回鹘文文献的研究。雅森·吾守尔曾先后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及匈牙利进行学术交流,孜孜不倦地钻研突厥语族古文字,尤其是对回鹘文木活字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亲赴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拓印了 960 枚木活字,系统考证了回鹘文木活字的形制、制作方法、使用特点及其年代等问题,与史金波合著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对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进行了深入研究。^①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详细介绍了敦煌北区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并对回鹘文佛典《佛祖历代通载》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北区第 464 窟是当时抄写和储藏佛经的重要洞窟,该佛典应抄写于元代,可能出自于第 464 窟。^②

(二) 回鹘文文献的年代

回鹘文写本最早可追溯到 8 世纪,而下限晚至 15 世纪,其内容庞杂,以佛教文献为大宗,而且多为残卷断篇,缺乏准确的纪年。如若利用这些文献讨论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需要对文献的抄写、刻印年代进行大致推断。

回鹘文文献的断代问题一直是学界探讨的学术难题。德国回鹘学家茨默提出,回鹘文写本可大致分为两个区别较大的时期:9—12 世纪与 13—14 世纪,他认为“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佛教典籍大部分都抄写或刻印于蒙元时代(13—14 世纪)”^③。法国学者 J. 哈密尔顿(又称哈密屯、J. 哈密顿)对敦煌回鹘文写本的出土情况进行了考察,考证了出自藏经洞回鹘文写本的抄写年代。^④我国回鹘学界的翹楚耿世民在《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古代维吾尔佛教文献。他提出了与茨默相似的观点,认为回鹘佛教文献可划分为两个明显的时期,早期大致为 9—12 世纪,晚期相当于 13—14 世纪,即蒙元时期,并认为《弥勒会见记》、伦敦本《八阳神咒经》、《十业道譬喻鬘》等文献属于早期之作,而现存的回鹘文文献大多属于晚期之作。^⑤

敦煌北区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大部分交付张铁山进行研究,他在解读这些回鹘文文献时,通常根据文献的出土地点、书写特点等特征,推测这些文献的抄写年代。他认为莫高窟北区新出土的文献大多抄写或印制于元代或宋元之际。

自 20 世纪初迄今,在敦煌“第二藏经洞”即莫高窟北区第 464 窟(伯希和编号 181 窟)中相继出土了许多汉文与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其中回鹘文文献甚为丰富,

① 雅森·吾守尔,史金波:《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②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出回鹘文文献综述》,《敦煌学辑刊》2009 年第 2 期,第 81—88 页;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佛祖历代通载〉残叶再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第 145—148 页。

③ (德)茨默著,桂林、杨富学译:《佛教与回鹘社会》,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第 20—30 页。

④ (法)哈密屯著,耿昇译:《敦煌回鹘文写本的历史背景》,《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1 期,第 273—282 页; (法)J. 哈密尔顿著,牛汝极、王菲译:《敦煌回鹘文写本的年代》,《西域研究》1995 年第 3 期,第 92—97 页。

⑤ 耿世民:《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41 页。



窟内还保存着一些回鹘文题记。据统计,出自第 464 窟且流失海外的回鹘文文献有 520 多个编号,还有一批尚未刊布的残片。^①敦煌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在挖掘和清理北区洞窟时,从第 464 窟获得了 25 件回鹘文残卷^②,估计应为元代之作。日本学者森安孝夫也关注第 464 窟,在《讲座敦煌》中介绍了该窟的出土文献,认为回鹘文文献大多为佛教典籍,其年代可推断为 13—14 世纪,最晚至明代初年。^③杨富学多次对第 464 窟进行了实地考察,发表了《敦煌莫高窟第 464 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④,考察了该窟的回鹘文题记及形制,驳议了该窟为西夏窟之说,认为第 464 窟最初开凿于北凉,原为禅窟,至元代时,当地回鹘人将其改建为礼佛窟,绘制精美的壁画,镌刻回鹘文榜题,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也应属于元代之物。

与此同时,吐鲁番、莫高窟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刻本文献数量极为可观,据统计有 1400 余件。另外,在莫高窟北区还发掘出一批珍贵的回鹘文木活字,是世界上迄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活字实物。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俄国探险家奥登堡先后来到北区洞窟,进行盗掘,带走了一些回鹘文木活字。近年敦煌研究院亦有新收获,迄今为止,回鹘文木活字总计达 1152 枚。^⑤有关木活字的创制年代,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伯希和认为元代在莫高窟北区可能存在一个刊经厂。^⑥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认定回鹘文木活字的使用年代应为 1300 年前后。^⑦

目前,在传世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回鹘文创制、使用年代的记载,学界对其年代只能依据间接材料与相关历史背景进行推测。1990 年,杨富学发表了《敦煌研究院藏的回鹘文木活字——兼谈木活字的发明》,参照回鹘在敦煌的活动情况与莫高窟兴衰的历史,认为这些木活字的创制可能早于 1300 年。^⑧肖东发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在宋元时代的发展与传播》一文中,提出畏兀儿使用木活字比西夏略晚,应出现在 13 世纪末和 14 世纪初。^⑨雅森·吾守尔和史金波合作撰写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考证了活字印刷术在西夏及回鹘中的传播、发展及其贡献,认为回鹘文木活字应创制于 12 世纪末到 13 世纪上半叶之间。^⑩杨富学在《回鹘文献与回鹘文

① 季羨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年,第 498 页。

②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综述》,《敦煌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156—157 页。

③ (日)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語文献》,山口瑞凤编:《講座敦煌·6·敦煌胡語文献》,東京:大東出版社,1985 年,第 9 页。

④ 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 464 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敦煌研究》2012 年第 6 期,第 80—97 页。

⑤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 350 页;彭金章:《有关回鹘文木活字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63 页。

⑥ (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83 页。

⑦ (美)卡特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188 页。

⑧ 杨富学:《敦煌研究院藏的回鹘文木活字——兼谈木活字的发明》,《敦煌研究》1990 年第 2 期,第 37 页。

⑨ 肖东发:《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在宋元时代的发展与传播》,《北京大学学报》2000 年第 6 期,第 102 页。

⑩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138 页。



化》一书中，将回鹘文木活字的使用时代推定在 12 世纪末到 13 世纪上半叶之间或沙州回鹘王国时期（1036—1070?）。^①彭金章系统地论述了回鹘文木活字的来源、最新发现及其特点，并分析了其使用年代，也认同了这一观点，即回鹘文木活字的时代大约推定在 12 世纪末到 13 世纪上半叶之间。^②

近年来，维吾尔族青年学者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对国内外所藏回鹘文刻本文献进行了收集整理，统计出目前约有 1400 件刻本。^③他运用了图像处理方法，探索出了判断文献印刷年代的新方法，并利用了图像处理软件，分析了刻本文献字符的长度、宽度，以及边框与刻印年代的关系问题。^④

此外，目前存世的回鹘文碑刻为数甚少，最早的是《乌兰浩木碑》，属于元代的石碑有四通：《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重修文殊寺碑》《建塔功德记》（又称《居庸关碑》）。1980 年耿世民率先对《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进行研究，为研究高昌回鹘汗国提供了第一手资料^⑤；1986 年他与张宝玺合作，刊布了《重修文殊寺碑》。^⑥近期，张宝玺再次对这一碑铭进行深入考证。^⑦

（三）元代畏兀儿佛教的发展概况

目前，学术界就畏兀儿佛教的发展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已做过一些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1982 年，孟凡人利用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详细考证了回鹘佛教的发展历程，讨论了回鹘僧人在内地的活动，并探讨了高昌佛教艺术与敦煌石窟艺术的密切联系。^⑧同年，刘迎胜考证了佛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流传和发展状况，其中专门论述了元代佛教在高昌地区的流行情况、著名畏兀儿僧人及其影响。^⑨1983 年，陈世良等学者撰写了《藏传佛教（喇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考证了藏传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发展，认为蒙古的藏传佛教与吐鲁番地区的藏传佛教有过频繁的交流，达到了交相融汇的地步。^⑩1991 年，陈新齐在《回鹘宗教演变考》一文中，概述了回鹘历史上所信奉的萨

①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 352 页。

② 彭金章：《有关回鹘文木活字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56—63 页。

③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回鹘文雕版印刷密宗文献概述》，见张定京等主编：《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 页。

④ 孙飞鹏，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对回鹘文印刷文献进行图像分析的初步结果：断代和印刷方法的新探索》，《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277—286 页。

⑤ 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 年第 4 期，第 515—529 页。

⑥ 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 年第 2 期，第 262—263 页。

⑦ 张宝玺：《喃答失太子〈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再考》，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 3 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8 年。

⑧ 孟凡人：《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新疆社会科学》1982 年第 1 期。

⑨ 刘迎胜：《元代西北地区的佛教》，《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2 年第 6 期。

⑩ 陈世良，谭吴铁，陈国光：《藏传佛教（喇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新疆社会科学院首届学术报告会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印，1983 年，第 284—326 页。



满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①1996年,张羽新依据汉文史籍,梳理了元代畏兀儿喇嘛僧文献出处,并论述了他们在元朝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②

1998年,杨富学率先推出了《回鹘之佛教》,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回鹘佛教的发展史。该书充分利用了汉文史料、回鹘文文献及考古资料,详细地论述了回鹘佛典的翻译、佛教艺术、佛教经济、功德思想等专题。^③2003年,杨富学又出版了专著《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的专著,该书对回鹘与佛教的早期接触,佛教在西域、河西回鹘中的发展及其衰败,回鹘佛教对西夏、蒙古佛教的影响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④

田卫疆在《高昌回鹘史稿》一书中,分析了高昌回鹘的三次宗教改宗及其后果,认为回鹘王室推行“诸教并蓄”的原则,境内多种宗教流行,但以佛教为主体宗教。^⑤李进新在《丝绸之路宗教研究》一书中,对高昌回鹘汗国的佛教信仰进行了讨论,并考察了其佛教艺术。^⑥陈高华的《元代内迁畏兀儿人与佛教》一文认为,内迁的畏兀儿人大多信仰佛教,在元大都佛教界颇有势力,积极从事于翻译、校刊佛经和建造、修葺佛寺等宗教活动,有较大的社会影响。^⑦王红梅的《元代畏兀儿高僧必兰纳识理考》论述了必兰纳识理(Prajñāsī)的佛学造诣及其佛教活动,必兰纳识理受封为“三藏国师”,历仕元中期的六位皇帝,为发展藏传佛教及佛经翻译作出了突出贡献。^⑧杨富学的《元代内地畏兀儿僧徒事辑》论述了畏兀儿佛教徒在元代的佛事活动,不仅详述了在元政府入仕为官的畏兀儿僧,并搜检汉文史料,考证了活动于江浙一带畏兀儿僧修行禅宗、天台宗等,并与临济宗禅师交往的事迹。^⑨尚衍斌的《元代江南一个畏兀儿家族的宗教信仰》以高昌普答实立家族为研究对象,对其家族在江南的宗教活动及其信仰的多样性进行考证,以此说明元代宗教信仰相对自由的宽松政策。^⑩

(四) 伊斯兰教在西域的传播

元明之际,西域宗教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兴的伊斯兰教征服了原有的佛教、道教、景教等宗教,最终完成了西域地区的伊斯兰化与突厥化。与此同时,畏兀儿人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宗教抉择,由佛教为主、各教兼容向一元化过渡,逐渐舍弃了原来信奉的佛教、景教、儒教等,皈依了伊斯兰教,最终走向一元化的宗教信仰。

① 陈新齐:《回鹘宗教演变考》,《新疆地方志》1991年第3期,第31、53—55页。

② 张羽新:《元代的维吾尔族喇嘛僧》,《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第50—59页。

③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④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⑤ 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5—195页。

⑥ 李进新:《丝绸之路宗教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7—257页。

⑦ 陈高华:《元代内迁畏兀儿人与佛教》,《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34—53页。

⑧ 王红梅:《元代畏兀儿高僧必兰纳识理考》,《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72—177页。

⑨ 杨富学:《元代内地畏兀儿僧徒事辑》,《宗教与民族》2003年第2辑,第161—180页。

⑩ 尚衍斌:《元代江南一个畏兀儿家族的宗教信仰》,《民族研究》2013年第5期,第100—108页。



伊斯兰教传入西域的时间^①，史无定论，有唐代说、宋代说、五代说等不同的观点。民国时期著名国学大师陈垣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书中，依据西安出土的《天宝元年创建清真寺碑》，主张为永徽二年（651）。民国时期学者王日蔚论述，“伊斯兰教之入新疆，盖约在十世纪之末与十一世纪之间，初由喀什噶尔叶尔羌以至和阗”^②。1947年，苏北海考证了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发展历程，提出“葱岭以西之回鹘人则在十世纪及十一世纪时，已改奉了伊斯兰教”^③。其观点与王日蔚的观点基本一致，均持宋代说。此后，苏北海的《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盆地考》利用汉文史籍，详细考证了伊斯兰教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传播过程，认为10世纪初伊斯兰教获得了喀喇汗王朝萨图克·博格拉汗的信奉，并已渗透到吐鲁番盆地。^④杨富学在《回鹘之佛教》一书中，论述了伊斯兰教势力对龟兹、高昌、哈密等地畏兀儿佛教的侵扰与征服，以及畏兀儿佛教走向衰败的过程。^⑤

邱树森认为蒙古西征消除了欧亚大陆的隔阂，有助于伊斯兰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播。^⑥李泰玉论述了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兴起过程，指出伊斯兰教的传播加速了佛教的衰败，并考察了其历史根源。^⑦李进新的《蒙古统治者与新疆的伊斯兰教》阐述了察合台后王的宗教政策，狂热的宗教“圣战”彻底动摇了佛教在西域的统治地位。^⑧田卫疆亦关注伊斯兰教在新疆及东察合台汗国的传播历程，利用汉文史籍与伊斯兰教资料，系统论述了元明之际伊斯兰教在天山北部、东察合台汗国内部的传播和发展历程。^⑨

孙振玉的《论察合台后王皈依伊斯兰教以及新疆地区伊斯兰化的完成》论述了伊斯兰教在新疆扩张的历程及其原因。^⑩李一新的《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详细论述了察合台汗国伊斯兰化的三个阶段。^⑪李进新的《伊斯兰传入库车辨析》考察了伊斯兰教在新疆扩张过程中两次大规模的传播高潮，10世纪初至11世纪中叶，伊斯兰教由中亚传播到喀什、于阗等地；14世纪中叶，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以武力的方式征服了库车，随后，其子黑的儿火者继续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征服吐鲁番等地。^⑫李进新的《论吐鲁番地区佛教的衰亡和伊斯兰教的兴起》论述了元中后期伊斯兰教在吐鲁番逐步取代佛

① 王日蔚：《伊斯兰教入新疆考（上）》，《禹贡》1935年2期；王日蔚：《伊斯兰教（下）》，《禹贡》1937年第4期；王治来：《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新疆历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陈国光：《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时间问题》，《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第76—82页。

② 王日蔚：《伊斯兰教入新疆考（上）》，《禹贡》1935年第2期。

③ 苏北海：《伊斯兰教传入新疆考》，《新疆论丛》1947年第2期。

④ 苏北海：《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盆地考》，《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第109页。

⑤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47页。

⑥ 邱树森：《元初伊斯兰教在中国北方和西北的传播》，《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76—80页。

⑦ 李泰玉：《新疆佛教由盛转衰和伊斯兰教兴起的历史根源》，《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105—116页。

⑧ 李进新：《蒙古统治者与新疆的伊斯兰教》，《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2期。

⑨ 田卫疆：《试探元末时代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4期；田卫疆：《试探伊斯兰教在东察合台汗国内部的传播和发展》，《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第96—103页。

⑩ 孙振玉：《论察合台后王皈依伊斯兰教以及新疆地区伊斯兰化的完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45—53页。

⑪ 李一新：《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第56—84页。

⑫ 李进新：《伊斯兰传入库车辨析》，《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第87—91页。



教的过程，分析了察合台诸汗宗教政策与佛教内在因素等导致佛教衰败的原因。^①

伊斯兰教的传播导致新疆地区的宗教走向一元化，语言文字亦随之走向一元化，促使了现代维吾尔族的形成。同时，随着宗教信仰的一元化，东察合台汗国境内操突厥语的其他民族与蒙古人逐渐融入当地的维吾尔族之中。这一现象有利于现代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并对其民族文化、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及风俗习惯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钱伯泉的《维吾尔族的形成和发展初探》讨论了畏兀儿形成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阶段。^②苗普生认为，塔里木盆地及天山以北地区居民的伊斯兰化是维吾尔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并对维吾尔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③加·奥其尔巴特在《察合台蒙古融入维吾尔族》一文认为，14世纪中后期察合台汗国境内的各蒙古部落由游牧逐步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放弃原始宗教而成为穆斯林，最终完全融入当地的维吾尔族人中。^④

二、概念界定与本书结构

（一）概念界定

“回鹘”与“畏兀儿”均为回鹘语“Uighur”的不同音译。然而，“Uighur”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有过不同的汉语译名。南北朝时译作“袁纥”，隋译作“韦纥”，唐朝称“回纥”，后改称为“回鹘”，即“回旋矫健如鹘鸟”之义。元代，聚居于“五城”，即哈喇火州（亦作哈刺和卓，又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别失八里（又称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彰八里（今新疆昌吉市）、仰吉八里（今新疆玛纳斯县西北）和焉耆一带的回鹘被称作畏兀儿，有时又译作瑰古、畏午儿、委兀儿、畏吾儿、畏吾尔、畏吾而、畏吾、畏兀、伟吾而、伟兀、伟兀尔等不同的译名^⑤，这些均为“Uighur”的不同音译。宋元之际，生活于河西、西域一带的回鹘人曾先后建立了甘州回鹘、沙州回鹘、高昌回鹘及龟兹回鹘等地方政权，皆称为“回鹘”，而且其民族古文字一直被学界称为“回鹘文”。故而，在本书中，为了便于叙述，对元代生活于五城一带的族人均称为“畏兀儿”，在论及唐宋时期的族人、地方政权及其使用的文字时，以其约定俗成之名，均称为“回鹘”。

（二）本书结构

分析了察合台诸汗宗教政策与佛教内在因素等导致佛教衰败的原因。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详细收集整理了已刊布的古代回鹘文文献，利用汉文史籍的记载及外文研究成

① 李进新：《论吐鲁番地区佛教的衰亡和伊斯兰教的兴起》，《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18—21页。

② 钱伯泉：《维吾尔族的形成和发展初探》，《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21—128页。

③ 苗普生：《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第6页。

④ 加·奥其尔巴特：《察合台蒙古融入维吾尔族》，《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67—68页。

⑤ 陈高华：《元代新疆史事杂考》，见新疆人民出版社编：《新疆历史论文续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4页；王日蔚：《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演变考》，《禹贡》1937年第4期，第443—461页。